

社会信用协同治理:制度、技术与文化^{*}

程民选¹ 李晓红²

(1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2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阳,550025)

摘要:社会信用治理中,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不可或缺。这里的制度是关乎信用的制度的统称,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能够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

关键词:社会信用;协同治理;信用制度;信用体系;信用文化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3.002

基于国家社会信用治理的需要,国务院继2013年1月颁布《征信业管理条例》后,又于2014年6月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法律、法规、标准和契约为依据,以健全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合规应用和信用服务体系为支撑,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这一开宗明义的表述,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以及需要协同进行的三个方面,即信用制度建设,包括征信系统、信用评级机构等的信用体系建设和诚信文化建设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关系,都做出了明确的交代。本文拟就制度、技术和文化在社会信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展开讨论。本文所论的制度限于信用制度,技术专指社会信用治理的技术方面即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①,而文化则指信用文化的培植。

一 健全的信用制度是现代信用社会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行为规则,形成人际互动的基本规范。制度由正式制度(法律、法规、规章)和非正式制度(习俗、惯例、内化的规则)以及他们的实施特征组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通过实施机制区分开来,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实施的特点,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这里所讨论的制度不包含非正式制度,而是指关乎信用的正式制度。

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追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成为可能,对于保障交易双方守信,使得交易能够顺利开展至关重要。这种保障合约履行的机制,除了中止交易的可置信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狭义社会信用体系包括征信系统、信用评级系统和信用管理系统等,是直接 with 信用信息征集、处理、利用和监管有关的技术体系。

威胁以外,信用制度对失信行为的事后惩罚机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止交易的威胁只对重复交易的情形适用,在匿名社会中,当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中止交易的威胁作用非常有限,因而信用制度对失信行为的事后惩罚机制就十分重要了。这种重要性源于信用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使得交易主体即使是在非重复交易中,也能形成交易对方守信的理性预期。一是信用制度对已经发生的失信行为实施了规定的惩罚这一事实,向交易主体显示了这样的信号:任何失信的行为即使在事前没有得到控制,在事后也必将受到惩罚。二是慑于信用制度事后惩罚的效力,交易主体即使是在一次性交易中也会率先选择守信,并预期交易对方也会守信,于是交易得以完成。

联系转型社会的现实论,与信用有关的制度建设对于主体在交易中是否选择守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转型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多边交易大幅攀升,交易从熟人社会迅速向匿名社会过渡,然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的前提下,同一交易主体分别对不同交易对手的多边交易实际上等同于一次性交易。要实现交易从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的扩展,必须解决好多边交易、一次性交易中的机会主义问题,而这毫无疑问只能通过各个层次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些制度安排形成信用主体的激励和约束,影响主体守信与失信的成本和收益,作用于主体的预期而最终影响信用行为选择。如果说以上仅仅是理论分析的话,那么国际经验已经表明,如果转型过程中信用制度没能及时建立起来,这样的国家就将一度成为低信任度的社会。在缺乏制度信任的交易环境中,由于强制的正式第三方的缺位,人们将不得不利用私人关系来保障交易实施,而利用私人关系来保障交易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实施和扩展,显然无法依靠私人关系而有赖于正式制度的保障,这应当是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理解信用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基点。

那么,关乎信用的制度有哪些呢?从现代信用社会建设的高度看,与信用有关的制度应是一个较之与社会信用体系有关的制度宽泛得多的体系,包括现代产权制度、合同法、公平贸易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系列法规,以及规范各类跨期信用交易关系与行为、严厉打击各种欺诈行为的法律法规等,共同形成了现代信用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制度结构:有效产权制度是现代信用社会的制度基石,规范交易行为的制度、规范跨期信用交易的制度,以及惩治失信行为的制度等构成现代信用社会的制度支柱。其中,合同法、公平贸易法等是直接针对交易过程的法律,旨在规范经济主体的交易关系和行为,保障合约的履行和交易的公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是为解决缔约当事人地位不平等而制定的法律,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不受侵害。规范各类跨期信用交易关系与行为的法律法规,包括规范信贷、保险、证券、期货、衍生金融商品等各类跨期信用交易的法律法规,虽然门类不少,但其共同点都是针对跨期信用交易关系与行为,旨在维护跨期信用交易秩序。至于打击各种欺诈行为的法律法规,多数体现在各有关法律法规的罚则上。对于上述法律法规,显然需要着眼于现代社会信用治理的需要重新审视,修订完善,使各类法律法规在所规范的不同领域中真正发挥对失信行为的强制约束作用,以切实维护现代市场经济秩序。

上述治理社会信用的制度中直接规范信用关系的,自然是西方国家所说的信用管理立法。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在美国生效的与信用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中,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因此,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房产、消费者资信调查、商账追收等行业受到了直接和明确的法律规范与约束。^①西欧发达国家不仅制定了与信用有关的国内法律,而且共同制定了在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有效的信用法律。尤其是欧债危机发生后,促使欧盟加快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步伐,强化在欧盟层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统一注册和监管的法律框架。

^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研究”系列报告之五》。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定要强调立法先行,这样才能切实保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虽然我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千呼万唤已经于去年出台,然而我国信用立法工作步伐迟滞,诸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管理办法》、《企业信用管理条例》、《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呼吁了十年迄今仍然出不来。虽然这可以表明我们对于信用立法的严谨态度,但诸多信用法律法规迟迟未能推出也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议最好尽快推出并在实践中予以总结和修订完善。

二 狭义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信用社会的技术手段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界定并不统一,存在广义与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概念。根据国际信用评估与监督协会(ICASA)的表述:一个人或单位做了失信的事将同时受到两种惩罚,一是法律惩罚,二是社会惩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诚信度,就取决于上述两个惩罚的力度。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就是社会信用体系^①,它是以信用信息的收集与传播为主要手段的。社会惩罚是对失信者的法律惩罚的有力补充,二者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的诚信度。将社会信用体系界定为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很好地解决了信用行业、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中的分工与职责问题^②。相应地,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信用信息数据库、信用行业的发展与自律管理以及信用评价标准^③。

ICASA 将社会信用体系界定为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这一界定的优点是突显了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匿名社会的重要性,其不足在于对传统的社会惩罚机制有所忽略。事实上,在社会信用体系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社会惩罚机制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作用,不仅以在圈子内部的声誉贬损甚至逐出圈子得到表现,而且还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反映出来。由于声誉评价和社会舆论与文化息息相关,可以通过信用文化建设,优化信用文化环境而发挥作用,因而这里仅仅就社会信用体系论,而不涉及传统的社会惩罚机制。

ICASA 对失信行为的界定隐含两个基本假定:其一是信息不对称,其二是信用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信用主体没有机会主义倾向,自然不会成为失信者;而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即使信用主体有机会主义倾向,由于没有人会主动受骗,那么信用主体也失信不了。信息不对称已是学界的共识,而信用主体是否必然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涉及对人性的不同假定。根据我们的研究,信用主体是自利和利他的对立统一,自利倾向是人的基本行为倾向,由人的利己心所决定。但在长期利益的追求中,自利倾向并不会导致失信;只有当自利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即自利的主体不择手段谋求短期利益时,这样的主体才会违约失信。^④于是要有遏制自利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的有效手段。就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和有效遏制自利倾向嬗变为机会主义倾向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技术系统。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ICASA 将社会信用体系定义为“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而且惩罚的实施“以信息的收集与传播为主要手段”。

为什么社会信用体系能够通过“以信息的收集与传播为主要手段”,而成为“对失信者的社会惩罚机制”?这是因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有利于解决非重复博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使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将博弈时“一对一”——即失信者蒙骗对方的格局,改变为“一对多”——即一旦有失信记录将可能面对全体人民的惩罚的新格局;将失信者与单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一次性博弈,转化为失信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重复博弈;将短期中静态的信息不对称,转变为长期内动态的信息对称。于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从总体上改变了博弈的格局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置身于其中的经济主体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影响经济主体信用行

① 显然 ICASA 所论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狭义的概念。

② 国际信用评估与监督协会[ICASA]文本,2006,第140页。

③ 国际信用评估与监督协会[ICASA]文本,2006,第143页。

④ 程民选:《信用主体: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财经科学》2008年第3期。

为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为什么是技术系统的理解,需要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的关系入手。依据青木昌彦的理解,制度既是博弈规则也是博弈均衡^①,因而在博弈中形成的信用制度是约束信用行为的规则。而社会信用体系是信用主体信用行为和信用状况的“簿记”,是记录信用行为并载入信用信息数据库,以及信用评级等的技术系统。虽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涉及有关制度的建设问题,即如何保障这样一个技术系统有序和有效运转的制度规定,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明确区分社会信用体系与信用制度。打个比方,如果将信用主体看作驾驶信用之车的上路者,为保证“交通秩序”正常,既要制定和实施“交通法规”即信用制度,又要有“交通警察”即工商、税务、银行、社保、海关、技监、药监等的监管,还要有“电子警察”即信用体系的记录监控。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仅有信用制度的建设是不够的。这就如同仅有交通法规,而没有能够低成本实施监控的技术手段,交通监管难以奏效一样。仅有交通法规和交警是不够的,高效的交通监管还需要相应的技术系统支撑;而保证这一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样需要一定的制度规范。同理,为保证信用秩序,仅有信用制度建设(包括法律法规和执法监管)也是不够的,客观上还需要类似电子交通监控系统这样一个社会信用监控技术系统。这一社会信用监控技术系统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电子交通监控系统,对失信行为进行及时记录并载入信用信息数据库,以及进行信用评级和社会审计等,都将使失信者无以遁形,难逃人们不再与之交易的社会惩罚,如果触犯法律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惩处。显然,这一社会信用监控技术系统正是本文所论狭义的社会信用体系。虽然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行同样需要一定的制度规范来保障,但其发挥的是形成社会惩罚机制,并为支撑信用制度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信用信息支持的技术性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将社会信用体系看作维护社会信用秩序的技术系统。这一技术系统的构建和完善,不仅形成现代匿名社会不可或缺的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机制,而且为信用制度这一法律惩罚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三 鲜明的信用文化是现代信用社会的文化根基

信用文化是与信用活动共生的文化现象,总是形成于信用活动中,一旦形成又对信用活动产生影响。信用文化既表现为人们的信用价值观及其内化的信用行为规范,又可以一种既有的生活样式来引导和约束人们的信用行为选择。本文对社会信用治理进行文化视角的考察,主要关注的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观念形态的信用文化主要指在共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诚信理念、商业道德与契约精神。它能使信用主体产生自我约束性,在实践中努力克服非理性冲动行为或者有悖于社会规范的行为,遵守经济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诚信原则。因此,以诚信理念、商业道德与契约精神为内容的现代信用文化系统,是人类社会降低交往成本的社会机制,并营造了信用主体置身其中的文化“软环境”,对主体信用行为的选择起着“软约束”的作用。

信用文化环境因其作用范围的大小,存在着类似层级结构的区分。在宏观层次上,一个国家的居民拥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居民的文化。这一层次的文化环境是一个社会提倡的主流文化,涉及核心价值观、基本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观念等。宏观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倡导的信用价值观念,是在正式教育体系和思想文化传播中以各种形式不断地灌输给公民的信用文化。

中观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表现为所谓的“亚文化群”,即拥有与其他群体存在较为明显差异的文化的群体,其内部成员的互动频率远远高于与群体外成员的互动。为了节省互动费用,群体成员往往会选择集中或者相对集中居住。在该地域范围内,成员拥有区别于其他地区居民的文化,他们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某些共同观念和非正式规范。与群体外的成员相比,群体内的成员拥有更为接近的心智模型和

^① 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的制度变迁》,见[法]克劳德·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认知结构,这使他们更容易相互沟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更容易相互信任。因而,这一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对于主体的信用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于区域性的交易扩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观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表现为所谓的“圈子”文化。与中观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一样,该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以人们的互动为基础,只不过相对于中观层次,该层次涉及的范围更小,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使得这一层次的文化因素对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作用更为直接,影响也更大。

不管哪一个层次的信用文化环境,对信用主体信用行为的选择约束都是一种“软约束”,这种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信用行为的自我筛选机制和社会评价标准。一方面,从行为主体的行为心理来看,行为主体倾向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所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自我筛选。当然,由于这种自我筛选是在已经内化的行为规范的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当行为主体的行为与规范要求一致的时候,这种筛选过程是条件反射式的,只需要极短的时间来完成,因此这一过程几乎是在行为主体没有明显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相反,当行为人预期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不符合时,就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较长时间的抉择过程。这个抉择过程,除了成本、收益的衡量以外,对社会舆论的考量也往往是行为人难以取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社会评价标准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激励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当行为人的行为被社会规范所认可时,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获得高度赞扬;相反,当行为人的行为不被社会规范所认可时,就会受到谴责和惩罚。

信用文化环境的好坏取决于信用文化建设培植的状况,就转型期的中国论,信用文化建设亟需处理好传统诚信文化与现代契约文化之间的关系。历经30余年的经济社会变革,传统诚信文化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一个现代民事主体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传统自律式的、个人内向修炼的诚信道德显然没有了足够的约束力。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失去内在约束同时又缺乏外在有效约束的情形下,出现自利倾向的嬗变,机会主义恶性膨胀,失信行为泛滥也就难以避免,从而导致社会信用状况的整体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在强化外在约束的同时,重塑经济主体的诚信理念,并大力倡导契约文化。

契约文化是天生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文化类型。现代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经济萌生契约文化,契约文化形成契约经济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经济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契约文化在信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决不能因为契约文化最先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为其贴上另类标签。在强调契约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提倡传统诚信文化与契约文化的融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亲情文化特征,从而与契约文化相悖,但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成分都与契约文化不相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所体现的信用精神,同契约文化所体现的信用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前者突出个人内修,重视诚信原则的内化于心;而后者强调契约的外在约束,主张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都必须由约法规范,但在人际交往中都应讲求信用原则这一点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因此,二者是可以融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建设现代信用社会的过程中,配合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必须处理好传统诚信文化与市场经济契约文化融合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好了,传统文化的诚信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紧密结合,传统诚信道德与现代信用观念相得益彰,实现诚信道德与商业伦理的互动和契合,必将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信用文化,根本改变我国的信用文化环境,有力推动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加快我国现代信用社会的建设进程。

四 协同治理:从“计算信用”到“诚实信用”^①

以上分别从制度保障、技术手段与文化根基三个方面,论述了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与信用文化

^① 在《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中,笔者曾讨论由“计算的守信”升华为“诚信的守信”问题(见第六章“信用环境”中的论述),详见程民选:《信用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重新凝练为“计算信用”、“诚实信用”二概念,并从协同治理视角分析。

对于社会信用治理的不可或缺。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治理的成效如何,与是否实现了以上三者的协同治理息息相关。

基于经济学的理解,信用不外是主体的信用行为选择,即主体选择守信(履行合约)还是失信(违背合约)。而主体选择履行合约还是违背合约,显然与主体的诚信度、履约能力和外在约束力度都不无关系。如果主体诚信,在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自然会选择守信(履行合约);哪怕一时遇到困难,履约能力不济,也会千方百计做出履约安排,而绝不会故意失信(违背合约)。如果主体不诚信,就是具备履约能力也会主观失信(违背合约)。针对不诚信的主体,迫使其守信(履行合约)的途径就是加强外在约束的力度,这就好比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信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所做的正是强化外在约束力度的工作。其中信用制度是规范信用行为的硬性约束,违背了就要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处罚,属于第三方强制治理;而社会信用体系将每一个主体的失信行为记录下来,让上黑名单者受到社会惩罚,能够减轻现代匿名社会中信用信息不对称诱发的信用问题。而信用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则是通过以文化人,潜移默化塑造主体的诚信品格与契约精神,提升主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的诚信度,从而达到信用主体内化约束的效果。显然,对于社会信用治理来说,必须做到“内外兼修”,即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与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同时并举。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强化的是社会信用治理的外在约束力,而信用文化的培植育成则注重的是信用主体内在的诚信修为。只有实现了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共同协力,社会信用治理才能达到协同治理的高度,社会的信用良序才可望形成并得以持续。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对于社会信用秩序的维护不仅需要信用制度,而且需要社会信用体系。社会惩罚与法律惩罚二者不可或缺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完全依靠法律惩治失信成本高昂,这也正是现实社会中许多人遭遇失信时选择私了而不愿意诉诸法律的原因。而社会信用体系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社会惩罚相对于法律惩罚显然要经济得多。其二是任何经济社会中的违约行为并非都是主观故意的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只是那些主观故意的失信行为,而对于大量并非主观故意的违约情况,如因不确定性而一时难以履约或无力还债,法律不可能无视客观原因而对其进行处罚。但要真正弄清楚是故意违约还是一时无法履约有时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而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将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在案,无论是主观故意的违约还是一时无法履约都将受到社会惩罚:没有人愿意与违约者进行交易。这就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防范非主观故意的违约向主观故意的违约转化的机制,即法律难于处罚的那些心有诚意而一时无力履约的人们,面对可能的社会惩罚一定会珍惜自己的信誉,积极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千方百计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信用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信用社会中两大互为补充、以形成强有力外部约束的支柱,只有法律惩罚和社会惩罚共同发挥作用,社会信用良序才可望得到保障。

然而,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仅仅依靠信用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而实现的信用,还只能称为“计算信用”。“计算信用”与信用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有关,主要是通过信用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强有力的外在约束,使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信用主体基于失信成本与失信收益的比较而在外在约束条件下选择守信。概言之,“计算信用”是靠外在约束维系的社会信用,是信用主体面对法律惩罚与社会惩罚的可置信,权衡失信成本与失信收益而不得不选择的守信。显然,仅仅形成“计算信用”并非社会信用治理的理想目标,社会信用治理的愿景应当是实现“诚实信用”,即依靠信用主体自身的诚信品格而达致的社会信用良序,而“诚实信用”主要是信用文化培植育成的成果,即通过信用文化建设实现了信用主体诚信道德和契约精神的升华,主体真正形成了内化的自我约束。因此,信用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信用良序的形成和维系具有根本作用与决定意义。当然,要实现“诚实信用”这一愿景,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现实可能的状况将是在信用制度、信用技术与信用文化的协同治理下,实现“计算信用”与“诚实信用”的并存,其中信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结果,将是“诚实信用”的逐渐强化,成为信用良序中的主导成分。

(责任编辑 付长珍)